



(繪加靈李) 像畫賓作董

照亮中國史的人

亮軒

「他是研究甲骨文的權威。」

「中國上古歷史的專家。」

「一個書法家、篆刻家，字寫得特別多，印刻得特別少。他寫的藝術批評不錯。」

「我知道他是古文字學專家，可是那個我不懂。我喜歡的是他的隨筆散文，你有沒有讀過他的『飛渡太平洋』？收在中學課本裏。」

「董作賓？我不太清楚，不過名字倒很熟，是不是臺大的一位教授？發掘出來好多甲骨文的的那个人？」

如果你抓住任何一位大學生，問他們「董作賓

是誰？」他們很可能給你這許多不同的答案。那麼，董作賓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只限於用一句話來表示的話，應是「揭開了中國上古歷史之謎的人」。

河南，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有最豐厚的文化遺產，但是，河南是一個物質條件貧乏的省份。在這裏生長的人，給人的印象大多能吃苦耐勞，而猶不失溫厚。董作賓便是河南南陽縣人，在民國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董作賓生於祖居溫縣的董陽門村，距今整整八十年了。那個時候，誰也想不到這個呱呱墜地的嬰孩，竟然在自己的鄉土上，發掘了中國古文化的根，並且追索到了數千年來不為人知的源流。

他的家庭並沒有盼望他成爲一個學者，只希望他「知書達禮」便可，那正是一個有教養的家庭對孩子的普遍要求。基於此，在他二十歲以前，也斷斷續續的讀過一些書，不外乎當時通行的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等等。青少年時代，主要的工作還是經商，家裏經營了一點小本的買賣，替人做些手工業賺錢。在他十七歲的時候，惟一的弟弟董作義病卒，他不

得不遵從父親的意思，完全放棄了治學一途，專心營商。不過他仍然勤奮不懈的自修，並且在他的小買賣中加入售書一項，這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好書，新書一到，一定是自己先讀過了才擺出來賣。他又利用餘暇設館授徒，跟朋友組織文社，互相切磋。如此的生活，不難看出商業在他的心目中毫無份量。經過了四年，他的父親病逝，同年中他就考入了師範學校，正式的恢復了學生身份。在學業方面，他的優異表現被他母親看在眼裏，逐漸了解到經商對他是一種人才的浪費，在他二十四歲時，主動的命令他結束店務，到大城市去求學。從此，他正式的走上了學問之道。

當時的董作賓，距離「甲骨學」還是非常遙遠，差不多在整整十年中，他的興趣由寫作詩歌小說而辦報，再轉入小說方言民俗音韻的研究，不斷的著述中，顯示出他的興趣極其廣泛，連他自己也摸不清楚。廣泛的興趣還是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慾，直到他正式的接觸到甲骨文後，立刻豁然開朗，原來埋藏在他心底的，是一股另闢新天地的衝動，這股衝動在甲骨文上找到了發洩的方向，他一眼認出了甲骨文研究是

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大片處女地，那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新領域！

甲骨學的發現，其後與敦煌石窟、居延的流沙漢簡、大沽的清宮檔案被譽為中國近代學術史的四大發現。從此，董作賓與甲骨文結合了，那是民國十四年的事，此後數十年的顛沛流離，不但沒有使他的研究工作中斷，反而使他在困苦中發揮了更大的潛力，把十幾萬片三千多年前的朽物，磨礪得光輝奪目，在人類文化史上永恆的照耀着！

講起甲骨學的歷史，也充滿了傳奇性，中間經歷了數不清的驚濤駭浪。甲骨文在什麼時候出土的，事實上已無可考證，只知在清光緒年間，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的農田中，常常有甲骨發現。小屯村本身有四百年的歷史，在以往的歲月中，都是墳場，大約千年上下，了無人跡。在挖墳坑開荒地中，到底有多少甲骨文殘片被損毀，也不得而知了。

小屯村的村民，種地挖出甲骨後，就賣給藥店。無論是龜版或牛骨，經過了三千多年的時間，也都不易清晰辨認，何況也沒有碰到別具慧心的學者。藥店有時整片出售，有時磨成細粉，稱之謂「龍骨」，大

家都相信這種藥材可以醫治刀傷創傷。甲骨上的字，大多被藥材店的人刮了去，曾經有人一生以售賣「龍骨」為業，但誰也沒有意識到，那些文字正是打開中國古代史之謎的金鑰匙，是三千年以來中國學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文化之源。

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金文家王懿榮因為生病服藥，而恰好名著「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遊歷到北平京師，住在他家，偶然發現了當作藥材却有文字符號的龜版，一時驚喜交集，於是展開追索研究的工作。這個消息很快的傳開了去，立刻就有一古董商人絡繹於途的到河南安陽小屯村去搜購，再攜回大城市中轉售圖利。不數年之間，就掀起了一陣搶掘甲骨的熱潮，竟至於有贗品混跡市場。慢慢的也有人開始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孫詒讓曾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了上下兩冊的「契文舉例」，這是甲骨學史上的第一部專書。

不但中國學者對甲骨文有了濃厚的興趣，西歐人日本人也開始大量的搜求。小屯村民有些乾脆不務農事，專以挖售甲骨為業，因此也引起了許多權利的爭執，逼得官方不得不高懸禁令，不許百姓隨意挖掘，

不過並不能產生積極的遏阻作用。至民國前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年），前清遺老羅振玉，證實了甲骨文乃殷商王室之遺物，這個學理性的發現，奠定了甲骨學的原始基礎。早期研究甲骨文的中國學者，除上述三人之外（劉、孫、羅），還有國學大師王國維，至於外國人研究的，大多錯誤層出，甚至有買了一整批假貨去研究的人。

在十餘年中，研究甲骨文的人越來越多，可是各說紛紜，莫衷一是，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也不十分注意。研究工作偶有所得，也在屬於文字零星考釋的工作，並沒有對文化史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

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完整，並非是人才難求的問題。當時的羅振玉，關於甲骨研究的著述在質量上都很驚人，可以說是甲骨學的開山祖。王國維也找到了史記與甲骨卜辭中的部份關係。但一方面因為偽刻的贗品太多，兼以因為真正的學者沒有系統的參與田野間的挖掘工作，所以整理出來的頭緒總嫌單薄。到了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眼看這一批無價之寶，就快要被私人挖掘破壞得蕩然無存了，乃由中央研究院派了董作賓，到河南安陽小屯村作實地的調查，接着就展開

了官方的發掘工作。前後十年間，共計發掘十五次，董作賓一直直接的參與及主持這項工作。至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前的十年中，一羣學者不停的在研究室與田野間來回穿梭，他們不但挖出了甲骨，並有計劃的測





定了各坑的位置關係，測繪出殷商宮室的遺跡全貌，又發現了彩陶文化與黑陶文化，找到了大批的青銅器、陶瓷器，也

爲「甲骨學」以外，開拓了無邊的文化研究領域。又證實了中國早在殷商便已經有了毛筆書法，以及建築學的完整知識，並且摸索到了古代社會的結構與禮制。至於古代的名貴器物，如各種玉器、寶石、佩飾、鼓磬，更是不計其數，目前大部份都存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成爲國寶的重要部份。綜合一切的發現，也研究出殷商時代國勢之所及，早已南達爪哇、北至西伯利亞，東西廣被黃河長江流域。

這林林總總的發現，就是幾千人用幾十年的時間也研究不完，董作賓怎肯從這裏罷手。

他並沒有在外國留過學，他受過的治學訓練，與一般學子並無二致。惟一不同的，是他有自行解決困難的幹勁，抓住了一個問題，就緊緊的抓住不放，非要把它澈底的弄清楚不可。他能從殘碎的甲骨拓片及寫本上，認出在完整龜甲牛骨的任何部位，絲毫不爽，這不是單憑秀才式的紙面作業可以鍛鍊得來的本事

，而是實際的觀察比較。他用新的龜殼牛骨，詳細的對照、摹刻，研究每一道裂痕、骨縫、弧度，才能了然於心，而他的方法，早已跨進專業動物學者的門檻。但他並不是在研究動物學，只是「要把甲骨文弄清楚」。他曾經用放大鏡，仔細觀察契文的刻法，發現了甲骨文的筆順，接着進一步的歸納出各家各派的異同。這種發現，直接關係到他所做的「斷代研究」工作。由於挖掘時儀器的缺乏，他自己設法，僅僅用一細繩子，幾根木條，測量出坑穴中的複雜尺寸，所得結果竟與精細儀器求得結果完全吻合。抗戰期間物質條件貧乏，但也難不倒他，爲了要把著述印行出來，他手寫石印原紙、手研石印油墨，在煤油燈下，完成了——他被傅斯年譽爲「增長中華民族信史三百年」的巨著——「殷曆譜」。董作賓的三子董敏記得，在抗戰時的後方四川，他父親就以一個鄉間野戲台子權充研究室，極其將就的搭上遮板，糊上窗紙，在天寒地凍中，生起一盆火，日以繼夜的研究著述。書桌旁邊有一張破籐臥椅，椅上置毛毯一條，累了就在「工作」旁邊小寐，醒來接著幹。董敏當時很喜歡翻那一只火盆，因爲不時可以發現父親饑時果腹的殘留食

物——烤紅薯。他記憶中那個地方風特別大，日夜不停的吹着，而我們的古代文化史，就是這位孜孜不倦的學者，在寒風呼號中陸續展現出來的。

不過，這樣來談董作賓還不完全，他是一位在艱難困苦中不失真趣的人，發掘小屯時，參與工作人員感到生活沒有調劑，枯燥難耐，他便欣然的負起康樂活動的主持工作。在政府籌劃的發掘初期，河南地方人士很不諒解他們獻身學術研究的精神跟辛勤的工作，目為「盜掘古物者」而時加騷擾，並聲言「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表明對他們的激憤，又公然的私自挖掘售賣，事後他清理出規餘殘存的甲骨拓片影本之後，題名為「百姓之燈」，顯示出在痛切的惋惜中，仍不失忠厚長者的幽默風致。門生結婚，他的賀禮可以是一首鄉土氣息濃厚，輕鬆調笑的歌謠。在一生雜亂間，他的生活擔子極重，白天忙於繁瑣的工作，夜晚幫忙夫人照看孩子，要等到全家都睡了，他才能靜下心來執筆寫他那嚴謹的論文。董敏記得，他父親一遇天冷，經常一夕數次的替孩子們把棉被蓋好，有時是因為在夜深中他還沒睡，有時却因睡下不放心又起來察看。

他的甲骨文書法遠近馳名，識與不識，都喜歡求他的墨寶，雖在百忙中，他也從不拒絕，總是如期交卷。管區派出所的一位警員，經常一來就是幾十張宣紙求字，他也從不在人前表示出不豫之色，寧可犧牲睡眠，也不叫人失望。能處處為別人着想的人，並非絕不可見，但在如此的境遇中，還能處處為別人着想，萬中難得其一。

在甲骨學發展了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時候，他出版了一本「甲骨學六十年」的書，在其中，他提到在這六十年裏，雖然甲骨文對全世界的文化學者不再是生疏的名詞，但是真正的甲骨學，在他的眼裏，不過是「剛剛開始」、「也許還尚待起頭」。這是董作賓認識的甲骨學的領域，難怪他一生無論遭逢如何的困苦，都執著不放了。

許多人都把「甲骨學」目為專門學者的專業工作，以為與己無關，根本懶得過問，這個現象董作賓不是沒有看出來，但他並沒有「大聲疾呼」，而是回過頭來，用極其淺顯清暢的文字，寫下這本書，在書中，儘量的把「



董作賓」的名字隱藏起來，把「甲骨學」的名字發揚光大。用心之苦、宅心之厚，放眼當世學壇，庶幾近之者，又有幾人？從「平廬文存」上下兩冊中，收錄了他多年來的長短文章，論題範圍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但略加深思，就會發現他一生中都在為古中國文化的再現復蘇而努力。他的目標，並不是專業的、片斷的，而是要使甲骨學與整個中國文化融滙結合，與現代的中國互通血脈。

董作賓在學術史上的卓然地位，應以「殷曆譜」為標幟。

他編定「殷曆譜」的原則，也是他獨特之見。他認為古代歷史年代研究，須依線、點、段的漸進原則。線指的是古往今來一縱線的時間，必須合於天行之曆。至於點，就是可以在此縱線上，確定其事件位置的據點。段，是由據點之關連，而推證出線上之一段，這正是歷史上的「年代」。段之構成在點，點之確定在線，所以，線是歷史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依據。這個線，便是曆法了，無曆法便無信史，無信史則文化累積之經驗勢必動搖。殷曆譜便是在「線」上下了極大功力的一部書。

在作者與傅斯年的序文中，說明了那是一部記載殷商時代時與事的關係的書。曆指時間，譜指事件。我們可以想像，要從成千累萬的甲骨卜文碎片中，給殷商時代編定如此的體系，真是談何容易。根據他自己的說明，殷曆譜一書，是應用在歷史研究法中，比「斷代研究」更進一步的方法。試作甲骨文字分期、分類、分派的研究。他藉着甲骨卜辭中有關天文曆法的紀錄，以解決殷商的年代問題，而這個年代問題，早因史說紛雜，使治史者望而却步，或者乾脆否定其於歷史中的地位。經過董作賓在這一部鉅著中的訂正，數千年來的謎團雲開霧散。另外此書在於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結果，以供研究這一類學問的人做參考。歷代專攻此項「年代學」學者，經常屈曆以就譜，不問能否以譜證曆，這種本末不分的作法，混淆了歷史上時間與事件的關係，使得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他有鑑於此，乃奮然不避艱困，埋首於這項「由譜以證曆，非屈曆以就譜」的工作。曆的部份，以近代天文學的知識，詳加推算，求其「合於天」，譜的部份，必定遍徵信史，求其可信。全書中涉及禮制、世系、征戰、氣象、交通、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科學

技能等等。譜分日譜、旬譜、月譜，乃至編年，例舉條陳，圖譜論證互作參照，足可稱之爲「信史」。殷周之後，類此的曆譜，雖然也有少數，但不見得能合於天文的推算，包括春秋、左傳、史記在內。「殷曆譜」就成爲中國古史研究的根本基礎。

許多有極優越研究環境的學者，對於這部鉅著的產生，都驚訝不已，他們不能想像有人能藉三千年前的古文字，把三千年前近乎三百年中的「事」與「時」的錯綜關係，整理得那麼有條不紊不說，還能「合於天行之曆」，其實董作賓對自己的發現，也感到無限驚訝，這正說明了他有獨得天地造化奧秘的悟性。

我們今天的教科書中，能列入殷商文化的一段並確定中國信史可上溯至民國紀元前三千二百九十五年（西元前一三八四年）。每一個中國人，都由此知道直接有文字記載的信史，便達三千三百年以上。而甲骨學價值的發現，更確立了中國文明遠在商周以前幾千年便應發其端，因爲不可能有一種如殷商的文化，可以在短短數百年中發展得出來。董作賓曾比較各種上古文字，證明甲骨文早已越過古埃及的圖繪文字觀念。

我們今天能知道這些，並且知道這些事理的科學根據，建立了每個中國人的基本常識和信心，我們就不得不感謝董作賓。

暮年的他，心情是比較沉重的。六十五歲時，一次中風擊倒了他。經過了三個月，病雖然好了，從此言語却有些遲滯，身體大不如前，想到從前在田野與研究室間的龍馬精神，難禁時不我予之歎。但他並不消極，反而更加勤奮的埋首著作，寫出了許多足堪稱爲經典之作的論文。他不止給自己負責的「大陸雜誌」寫，也給其他的學術性刊物寫。有時還給國外的刊物寫。他照樣應聘到外國去講學，照樣的作學術演說。表面上，他是沉靜的，內心裏，不免爲他畢生致力的「甲骨學」來日的發展耿耿於懷。剛認識到「也許還尚待起頭」，而生命的燈火却已逐漸的黯淡，這位學者的心情，局外人也不難揣摩出來。也就因此，他更加勞累了，至親好友不時的勸他應以身體爲重，他也不理會。在白天，他指導年青的學者做研究，晚上，趕寫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身體益形衰弱。到六十八歲那年，竟然突發心臟病，經過整整一個月的治療才出院。這下應該讓他爲自己的健康警覺才是，可是他

還是不停的做研究工作，那一年還寫了好幾篇論文。但距離前次心臟病發不到十個月，他的舊疾復作，這一次，足足使他在病床上痛苦的輾轉了八個月，再也沒有讓他回到需要他的學術界來。

說他是一位甲骨文學者，大致不差，檢查他的生命史，三十一歲起，直到六十九歲去世為止，一直與甲骨文發生了不可解的關係，而且越來越濃。到了晚期，「董作賓」幾乎是「甲骨文」的另一面註解。不過，僅僅說他是甲骨文的學者，是很不公平的，那很容易使人連想到治文字學的小學，董作賓就變成了一個「古文字學家」了。事實上，他應是透過對甲骨學的鑽研，使中國古代文化的面貌，得以肯定地呈現的人。如果只以「古文字學家」或「考古學家」來看董作賓，僅僅是毫末之見，可惜這正是許多人對這位已去世十餘年的學者的看法。

在五卅運動前後，有幾位對中國古文化抱着極端懷疑態度的學者，倡言商周歷史為假的說法，直到董作賓以科學的方法、實證的精神，建立起「甲骨學」之後，這些肆意疑古的荒誕理論才不攻自破，而中國的歷史文化，也找到了堅實可靠的根源。

從這裏，我們發現，甲骨文是董作賓研究工作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對象。他以甲骨文為中心，使其與天象、文學、歷史、藝術相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學術體系。今天，凡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人，沒有例外的，都會有形無形的汲取了董作賓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的必經之路，他是學者中的學者。

從來學者可分博大與精深兩面，但能兼及者很難。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到：「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董作賓就是一座學術的金字塔，歲月遷延，也抹殺不了他的永恆價值。

兩年前董作賓的三子董敏，計劃在他父親八十冥誕的時候，出一本書紀念他的父親。他打算以他父親的甲骨文書法寫出的古今詩詞為主，襯上他多年來自己在攝影方面與詩詞境界可呼應的作品，編印成冊，名為「萬象」。甲骨文與攝影，乍看可能是距離很遙遠的兩回事，實際上只要認識董氏父子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創作，在氣質上竟是如此的相通。董敏雖然沒有繼承甲骨學的父業，但他對他父親的甲骨文，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原來董敏年方五、六歲時，就開始替

他父親磨墨，在一個直徑一尺的大圓硯台上，握着盈掌的大墨，努力的磨呀磨的，墨要拿正，磨要平磨，一點都不許浮躁，磨滿了一硯池墨汁，工作並沒完，他還要替父親拖紙，站在桌子對面，父親寫好一個字，他就把紙拖一拖，好讓父親在空白處再落筆。這個工作從稚齡一直擔任到大學時代，最後董敏設計一種槓桿輪軸相配合的「拖紙機」，寫字的人可以隨意的藉那個小機械把紙上下移動，他的工作才卸掉大半。由於這一段淵源，董敏對他父親的書法，更有特殊的偏愛，不過由於董敏長年看甲骨文都是從書案的對面「倒着看」，一直沒有注意到詩詞的內容。在他父親逝世多年後，他檢視遺物，驀然發現境界之高，韻緻之美，於是有了出這一本集子的念頭。經過兩年多的籌劃設計，這本「萬象」才趕到在董作賓先生八一冥誕時推出，比諸原來計劃，已足足晚了一年，晚固然是晚了，却正說明了他臨事不苟的精神，秉承了乃父之風。

從這一本甲骨文詩詞攝影集裏，不但可以領會出中國古文字超絕的智慧，體味到那詩詞和攝影所表現的境界與情操，更可以透視出上下兩代對自己的工作

付出的心血。最令人有感於懷的，是兩代之間對人羣、對良知的誠懇奉獻，藉本書而深相契合，這正是歷史血脈相承的鮮活實例。

翻開一頁頁的文與圖，看到了古老的文字與現代的攝影藝術交互輝映，不但衝破了代間的隔閡，甚至彌合了生死的分歧，心中不禁百感交集，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了。

本刊精裝合訂本

第六卷出版了

每冊95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